

上海城市审美风格演化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作用

陈一川 14307110157

I. 早期上海：吴越文化的接受者

上海地处长江下游平原。早在上海城出现之前，这一地区的吴越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在这种文化的包围中发展起来的上海城，其起初的城市审美风格极大程度上浸染于吴越文化之中。

吴越文化有由地理环境或是人文因素决定的数个方面：第一，江南地区物阜民丰，培养了吴越文化中随遇而安、知足长乐的性格。第二，吴越地区远离中原文化圈，因此相较于北方儒家文化中的礼教森严，吴越文化更加性情、率真。第三，江南地区的风景清秀、阴柔，所谓“春花秋月，暖雨熏风”的“烟雨江南”。再加上江南士人大多是避北方战乱或是政治斗争“衣冠南渡”而来，这些放弃斗争的安逸懒散的避难者与山青水秀的风景一起给吴越文化注入了纤弱、细腻的灵魂。

由于生活物资并不缺乏，吴越文化中罕少有对改造自然的强烈欲望。加之江南本身风景秀丽以及吴越文化纤细的特质，江南城市的城市审美更多地表现出“物我相融”的倾向。在建筑上，上海的古建筑也同样秉承了吴越文化“物我相融”的审美风格。此外，吴越文化中率性大方、兼包并蓄的部分也为将来上海化西方文化为己之一部分埋下了伏笔。

而关于上海城市设计对吴越文化的反作用却并不显著。上海具体建城年份说法不一，但均集中于13世纪末。换言之，上海在吴越文化群中扮演后来者的角色。作为后来者的上海则主要是通过学习、模仿与交流来融入吴越文化圈的。

II.“海派”上海：中西合璧

自1843年开埠以来，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上海逐渐成为了中外贸易的中心。向着远东第一大都市迈进的上海遭受了西方文化猛烈的冲击。并在独一无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独一无二的“海派”文化，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相应的城市设计美学。

在近代上海的空间构成中，租界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租界作为西方文明的物质载体，其对上海城的文化冲击远非间接的文化交流可以比拟的。西方移民在租界上建造的，与上海传统建筑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将西方文明活生生地带到了上海城面前。英租界上的独栋洋房遭遇上海古典的三进六院；黄浦江边的观景公园中，喷泉、雕塑、铁质长椅、植毯等强调工艺的景观与江南古典园林仿照自然、体现自然的理念相碰撞；上海英国总会底层的塔司干式柱，中部的仿爱奥尼式列柱，外墙的水刷石墙面，建筑内的大理石阶梯展现了石材的魅力，与中国传统的砖木材料相碰撞。在无数次的文化冲突中，上海文化发现西方文明拥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其生产方式，连带着生活美学与设计理念也就为开放的上海所效仿。

此时西方建筑设计上正处于新建筑时期，新结构、新材料和新技术广泛地运用于建筑中。在吴越文化的基础上，上海的城市设计美学逐渐开始追求西方文明所崇尚的经济性、时尚性和科技感。上海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时，并未抛弃自身的吴越文化传统，而是在保持吴越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不断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孕育出新的文化体系“海派”文化。反映在建筑上，就表现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以当时上海的特色民居——石库门为例。石库门有着江南传统的三进规划，进门是一天井，天井后为客厅，之后又是一天井，这一天井后是灶台和后门，天井和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但石库门在总体上却采用了来源于欧洲的联排式布局，没有江南古典住宅的抄手游廊等设计。且在材料上大量运用了石材而非传统的砖木材质（得名石库门也是因为其新颖的石质门框）。石库门建筑外墙也有西洋建筑的雕花图案，门头上的装饰常用三角形、半圆形、弧形或长方形的花饰，类似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上海文化独特的中西合璧、兼包并蓄风格在建筑上也可见一斑。

上海城市的这种设计风格也反哺了上海城市国际意识的深化。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成为了来中国淘金的外国侨民首选的居住地。设立租界后的上海，其外侨人口数几乎以10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增长速度远超过当时其他的几个通商口岸。新移民带来了更多的异域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这些异域理念为上海所吸收，促进了其进一步的国际化，更高的国际化水平则又吸引了更多的移民。人口的国际化与城市的国际化形成的良性循环为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打下了基础。

III. 现代上海：对立文化的融合

上海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但同时也坚守着古典的传统。但在这座复杂的城市里，各种对立文化远未达到和谐共生的地步。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古典、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处处存在。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全面剧变的大背景下，上海也曾一度迷失了方向。缺乏规划感的城市设计割裂了城市的历史与未来。旧上海已经失落，新的上海却仍在襁褓之中。

经过了数十年的痛苦磨合，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古典终于共生在了云间大地上。上海人逐渐意识到前述的种种二元对立已深深根植在上海城市风格中，正确的解决方法不是去

强制消弭这一对立，而是试图去使得对立的双方互相认同、相互交融。理念的更新也带来了审美导向的改变。新的“沪上八景”便可反映这种变化。《今日上海》评选的“新沪上八景”，既有“淀湖环秀”这样的自然之景，也有“十里霓虹”这样的人造之物；既有西方文明传播的产物“外滩晨钟”，也有传统中式建筑的余韵“豫园雅韵”；既有新时代的展望“摩天揽胜”，也有旧时代的追忆“枫泾寻画”。尽管在文化交融的路上尚未到达终点，但现代上海仍然努力平衡着各种对立的美学风格。外滩的欧式古典建筑、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包裹的现代摩天大楼与东方明珠塔、苏州河沿岸的近代工业遗产、静安区里涌泉坊、亨昌里等老上海弄堂、朱家角的水乡村落都能相安无事，共同和谐地组成上海的城市风格。

各种对立文化在上海共生的局面也仿佛成为了上海的一张名片。在这种“即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的氛围里，上海既能扎根于江南大地，获得内地文化的支持，又能从海外获取不同文化的资源，不断加深文化交融的深度。推而广之，事实上也许正是一个城市已有的审美风格吸引了具有相同审美取向的人们，而这些被吸引的人又带来了殊途同归的文化养料，推动了城市社会意识的进一步升华。

上海城市审美风格历经三个主要时期的变化。

随着古人在长江入海口的集聚，上海城作为文明与人口的载体被建造起来。吴越文化的特质给早期上海城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上海城内四处可见的吴越文化余韵正是社会文化决定城市审美风格的坚实例证。

开埠后的上海，西方设计文化迅速、大量地传播到上海并与传统的江南文化相碰撞、逐渐融合。随后上海城市转向了中西合璧的审美风格。这一变化说明社会文化发生变迁，城市的审美风格也会随着社会文化改变的方向而改变。同时，这种城市风格也导致了上海的进一步国际化。说明城市的审美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物质基础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的改变。

现代上海在文化上融汇了东西方的精髓，在城市风格上也坚定不移地走在中西合璧的道路上。同时这种城市风格也更深入地促进了各种对立文化在上海的交融。这再次佐证了前述的结论。

综上所述，城市审美风格演化与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风格决定于社会文化，随社会文化变迁的方向而发展；同时也作为物质基础反作用于转型中的社会文化，使其向更深入的转型方向演进。对此二者之间正反馈互作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对个性城市风格的产生、演化及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